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Luo Gang

罗岗 著

想象城市的方式

想象城市的方式

罗 岗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城市的方式/罗岗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3

ISBN 7-214-04219-3

I. 想... II. 罗...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043 号

书 名	想象城市的方式
著 者	罗 岗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朱晓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19-3/C·85
定 价	2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罗岗 1967年生,文学博士,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研究员,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兼及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著有《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2005)、《面具背后》(2002)、《记忆的声音》(1998)等,编有《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视觉文化读本》和《思想文选:2004》等。

出 版 人 刘健屏 出版统筹 佘江涛

创世记:传说与译注 冯 象

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 冯克利

谁是罗兰·巴特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汪民安

回归公共空间 许纪霖

理想国以后:政治哲学与法学论札 顾 肃

想象城市的方式 罗 岗

策划编辑 杨全强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朱晓莹

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n798@126.com

目 录

Part 1 漫卷西书

“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3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42
诸神时代	51
书边杂草	73

Part 2 都市拾荒

想象城市的方式	83
打碎都市万花筒	96
看得见的城市	104
看不见的城市	117

Part 3 文本寻踪

言说“大时代”	131
美好的八十年代	149
文学，跨文本	158
小说·秘史·启示	175
“时间游戏”的内与外	186

“上游”和“下游” 197

Part 4 坐而论道

中国人为什么要办大学? 207

“新课标”:历史与现实 224

“教室”里还有“经典”吗? 240

Part 5 如沐春风

面临双重困境的选择: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251

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 268

鲁迅形象的当代塑造 294

Part 1
漫卷西书

“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一、面对历史的沉思

打上引号,作为专有名词的“韦伯翻译”已经成为“韦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指韦伯著作在不同语种中的传播和流布,而且更关注韦伯思想是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文化所认同、选择、重组和阐释。因此,“翻译”不单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行为最终必须转换为一种文化内部的活动。“翻译”的效应往往体现在“翻译”的“历史性”上,即“翻译”通过语词的交换,将某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概念、范畴、话语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思想,带入另一全新的语境中,并且依据这一语境的要求,重新解释它们的涵义。具体到中国,确如汪晖所言,“翻译”存在着一个“主题化过程”,“即把欧洲历史中的特定历史过程和特定哲学思想转化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主题”^①。

根据这种对“翻译”的理解,我眼中的“韦伯翻译”,除了韦伯著述和

^① 汪晖:《人文话语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陈清侨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页371—372,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传记的翻译以及所谓“二次文献”——即引用、研究韦伯理论的文献——的翻译之外,更希望凸显中国人对韦伯理论的介绍、评述和运用,因为在这类文献中,借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更能显示出“翻译”作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也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韦伯式的问题”对处于现代化焦虑中的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早在1936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郑太朴译的韦伯的《社会经济史》,这套分四册的小书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万有文库”的一种。到了1977年,台北商务印书馆还将此书合并为两册,收入“人文文库”予以再版,译者名也改为郑林。不过,《社会经济史》的中译本没有前言后记,所以也无法了解为什么要翻译这本著作以及翻译的具体情况。但商务印书馆是把它作为汉译世界名著出版的,由此也不难想见韦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然而这只不过是单纯的翻译,把韦伯的理论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则是贺麟,他在1938年写的《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一文中,由于讨论思想道德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引出了对韦伯(当时译为“韦巴”)学说的介绍。^① 贺麟说:“据我所知道,持思想道德为体,经济实业为用的说法,对于现代的经济实业或资本主义思想道德的背景或基础,给以充分的理论发挥和事实根据的人,当推德国新康德派德大社会学家韦巴(Max Weber, 1864—1920,著有《宗教社会学》及《经济史》等巨著。英人 R. H. Tawney 所著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一书,其内容几完全为韦巴之 *Religionssoziologie* 一书的撮要报告)。我愿意先约略介绍韦巴的思想,然后再加以批评。”

贺麟介绍的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总之,韦巴的总结论,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实现,并非由于物质的自动,

① 贺麟:《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以下引用该文不再注明。

经济的自决；乃凭借许多理智的、政治法律的、精神的、道德的、宗教的条件而成。他叫做‘合理的长时间存在的企业、合理的簿记、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与合理的精神态度(Gesinnung)、生活态度和合理的经济道德’”。接着他提出两点批评意见：“至于韦巴学说的困难，据我个人意见，至少有两点。第一，他太偏重新教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决定力量，几乎有替新教作宣传的嫌疑。他把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完全归功（也可以说是归罪）于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等少数宗教家，未免太抹煞了许多大发明家、实业大王、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等对于资本主义的贡献。这与把中国近年的现代化的建设归功于少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把欧洲的大战归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皆同是无甚意义、不合事实的说法。第二，韦巴只是就事实而论，未能指出思想伦理与经济实业的逻辑的必然发展的影响，经济实业对宗教改革的影响，及伦理思想的变迁，均同样地是摆在眼前的事实，韦巴如果敢忠于事实的科学态度，就不应该偏重一面，而完全抹煞其他一面。”

尽管贺麟采取“中和”的态度，“就哲学理论而言，精神与物质乃同一实在之两面，经济实业与思想道德乃是同一社会生活之两面，不能互为因果，互相决定”。但他仍然特别拈出“就经济实业的本质言，经济实业乃道德努力的收获。孟斯特贝格(Munsterberg)说实业乃是一种 ethical achievement，与上面引述的韦巴之说，有相契合处，实是值得我们深长思虑的不易之论”。可见贺麟思想的重心还是偏向了思想道德。至于韦巴学说是否影响了贺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特别是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试图重新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①，是否受到韦伯思路的启发，这样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

贺麟之后，韦伯思想过了将近四十年才在中国一个孤独的思想家那儿获得遥远的回响，这个思想家便是顾准。顾准在1973年6月11

① 参见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文化与人生》，页4—1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此文原于1941年8月刊登于《思想与时代》第1期，被视为“新儒学”兴起的标志。

日完成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在明确提出“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的论断之后,认为马克思对于这种清教徒精神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也作过充分的估计,并且认为:“马克斯·韦伯得到马克思的启发,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我仅知书名,没有读过。”^①

那么顾准是从哪儿得知韦伯理论的呢?原来他1962年返回经济研究所后,开始翻译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64年译完全书。熊彼特虽然在书中只有一处提到马克斯·韦伯,即第一篇“马克思的学说”的第二章“社会学家马克思”,原文是这样的:“马克思并不认为各种宗教、哲学、艺术诸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抉择,或者可以还原为经济动机,或者无关重要。他不过试图揭露塑造它们的,或者造成它们的盛衰兴亡的经济诸条件。马克斯·韦伯的全部事实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熊彼特为“马克斯·韦伯的全部事实和论证”加了个脚注:“这指韦伯对宗教社会的研究,特别是收集在他的选集中的有名论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②很显然,顾准是从这儿获悉韦伯和他的著作的。但若误以为“熊彼特可能在注脚当中引了一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他(指顾

①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页327,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页17—18,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是韦伯研究的一大关节,在此无法展开。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韦伯讨论中国的著作《儒教与道教》问世后的三四十年来,几乎没有相称的评论和阐释文章,倒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维特孚格(K. A. Wittfogel)于1930年代批评道:“韦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非辩证—非马克思主义方法,因此即使书中充满了精彩的片段,却无法引导出唯物论的历史图像。本书是一堆个别有价值的历史事实的废墟,没有历史……但韦伯毕竟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唯一认真去问‘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学者,他的非马克思主义方法却阻碍了他对于这个正确的核心问题提出充分的解答”。参见顾忠华:《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韦伯观点的再评价》,载<http://sociology.nccu.edu.tw/socdep/newpagell.htm>。

准——引者按)居然紧紧抓住注脚不放,往前推,推到和韦伯距离不远的地方”^①,那未免过甚其词了。因为熊彼特在书中对韦伯理论多有引申和发挥,譬如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被它自己的成就所杀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著名结论:“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更重要的是,熊彼特在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的第十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基本上是综合了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韦伯的看法,来论述和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主义性质。顾准在写《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时,参考了熊彼特的有关论述,从而也就间接地受到桑巴特和韦伯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合理性的标志是将货币单位提升为计算的单位,“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转变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式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熊彼特在“复式簿记”后加了一个脚注,称“桑巴特曾强调过,而且出色地过分强调过这个要素”。同样,韦伯也曾十分强调这个要素的作用。^②作为会计学专家的顾准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重要的结论,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中讨论“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时,除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论述,他特别强调指出:“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③最后这点很显然是来自韦伯,更有趣的是顾准在“复式簿记”后也加了一个脚注,称“桑巴特认为复式簿记的发明,其伟大可与血液循环相比”。这就是熊彼特说桑巴特对复式簿记强调得过分的地方。

顾准是透过熊彼特才接受到韦伯的,但并没有妨碍他对韦伯理论

① 朱学勤:《思想与学术的位移》,载《东方艺术》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③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页322。

形成相当独到的理解,并且根据这种理解来研究和阐释“中国问题”。他的关于“古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起资本主义”的论述,的确与韦伯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顾准由此出发展开的更为紧张的思考是:“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完全用韦伯理论来概括,可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思考却开启了1980年代“韦伯热”的大门。

80年代“韦伯翻译”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互为表里。尽管80年代初已经出版了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不仅由于译名的关系(将“韦伯”译为“维贝尔”),更因为社会没有形成接受的氛围,所以这本书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中后期翻译出版的韦伯著作,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韦伯由“冷”到“热”,个中缘由,的确耐人寻味。可以说它几乎涉及到80年代思想文化母题、知识生产传播体制和意识形态背景等所有重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的“韦伯翻译”扎实而沉稳地进行着,韦伯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正陆续译出,并且不止一个版本,给研究者和阅读者以参照对比的余地。更重要的是,随着9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反省以及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被长期视为“现代化论者”的韦伯也开始显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形象。一方面所谓“韦伯著述史”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已有学者提出“韦伯研究再出发”的倡导;^①另一方面则有学者借着“韦伯式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持续而深入的探讨。^②人们有可能在新的现代学意义上理解韦伯。当然,这种新的意义也必须放置到90年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中才能予以理解。这一由“韦伯翻译”引发的复杂现象再一次证明:“翻译”作为文化交往行为最终必须落实到一

① 参见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文选第一卷》,页1—11,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② 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页381—42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种文化内部的活动。

二、顾准与韦伯:不容忽视的遗产

顾准也许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的“孤独”不仅是生前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且是在可以公开讨论他的思想、知识界出现了所谓“顾准热”的今天,他赢得的也只是气节的推许和道德的赞叹,人们对他的思想还缺乏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探究。这种热闹中的寂寥,才是更值得悲哀的。

凡是认真读过《顾准文集》的人,或许都能感觉到他对某些问题的追究(譬如“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生和发展”,“古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其实与韦伯有某种渊源关系。顾准在1973年6月11日完成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在明确提出“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的论断后,认为马克思对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推动力的清教徒精神也作过充分估计。整篇文章流露出顾准对韦伯学说的了解,那么他凭什么认为韦伯是受马克思的启发?他自己又是经过怎样的途径接受韦伯思想的呢?

顾准思想的研究者告诉我们,顾准“居然只通过翻译那本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可能在注脚当中引了一点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他居然紧紧抓住注脚不放,往前推,推到和韦伯距离不远的地方”^①。我们丝毫不应该怀疑研究者对顾准的推崇,但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的确无助于深入了解顾准的思想。早在1934年,吴文藻在一篇介绍德国社会学的文章中就提到韦伯,将其归入“历史社会学派(或文化社会学派)”,并特别点明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文化型范

① 朱学勤:《思想与学术的位移》,载《东方艺术》1998年第1期。

学”。^①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太朴翻译的韦伯的《社会经济通史》。尽管顾准声称没有读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他是否有可能接触过上述文章和译著呢？更何况，1962年他重回经济研究所，开始翻译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几乎同时，姚曾虞也在翻译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他们之间有交流的可能吗？

即使抛开这些推测，单就熊彼特的书而言，所谓“紧紧抓住注脚不放”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熊彼特确实只在书中一处提到韦伯，但这本书对顾准的启发却远不止于此，因为熊彼特在书中对韦伯的理论多有引申和发挥，譬如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被它自己的成就所杀害”，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韦伯的著名论断：“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更重要的是，熊彼特基本上是综合了韦伯和桑巴特的看法，用以论述和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主义”性质。顾准参考了熊彼特的有关论述，从而也就间接地受到韦伯和桑巴特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合理性的标志，是将货币单位提升为计算单位，“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转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式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他在“复式簿记”后加了一个脚注，称“桑巴特曾强调过，而且出色地过分强调过这个要素”^②。同样，韦伯也曾十分强调这个要素的作用，他在《中世纪商业公司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n Mittelalter*）一书中专门研究过簿记的发生、发展过程。^③ 作为会计学专家的顾准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重要的结论，但他仍然将这一合理化的因素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考虑，所以他讨论“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时，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论

① 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页18，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② 熊彼特著，绛枫（顾准）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页154—155。

③ Max Weber,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n Mittelalter* (Stuttgart: F. Enke, 1891). 亦可参见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虞译）第三编的有关论述。